

# 生态书写与现代性反思： 解读阿来“山珍三部曲”

张 凡 张银蓉

**【摘 要】**阿来在2015-2016年相继推出《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三部中篇力作,不仅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生态之风,更丰富了21世纪以来文学书写的地域景观和人文精神。在被誉为“山珍三部曲”的系列中篇中,阿来以其一以贯之的虔诚与热情倾力书写生他养他的雪域高原和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同胞,作家极目所望及笔触之处不只是故土与乡情里的人情世故,更有藏族地区多样的自然生态与风俗民情,其间的表达与反思彰显作家鲜明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整体观。

**【关键词】**“山珍三部曲”;生态书写;现代性反思;声音意象

**【作者简介】**张凡、张银蓉,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

**【原文出处】**《民族文学研究》(京),2021.2.102~109

**【基金项目】**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阶段性成果。

出生在川西北藏族地区一个偏远村寨的作家阿来,在雪域深处长大,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与自觉,使他对雪域高原的书写成为一种坚持与宿命。众所周知,阿来创作的这种倾向性浸透了作家深沉的乡土情怀,正如学者黄轶在比较新世纪以来迟子建和阿来乡土写作异同时所强调的,这不仅是作家“对原生态文化自然神性的尊崇以及建立在这尊崇之上的对神的消解与人的堕落的忧患、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悲悯伤怀”,更是作家“对乡土家园的追怀,传达着浓郁的精神乡愁和原乡意识,渗透着深刻的人文情怀”<sup>①</sup>。阿来这份饱满而深刻的乡土情怀和人文关怀,使得其笔下的生命空间呈现出一种“万物皆有灵”的神性特质和审美倾向。毋庸讳言,人类社会的所有过往,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现在,甚至将来。在以川藏地区村寨生活为叙事背景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河上柏影》<sup>②</sup>(通称为“山珍三部曲”)中,作家阿来以充满诗意的文字再现了生息繁衍在雪域高原上的族群与大自然之间发生的那些事,以及随之而生的那些情,其间凸显的是雪域生命

的虔诚、饱满和炽热。细读阿来“山珍三部曲”所观照到的种种,不难发现,作家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和灵性的文字,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情透纸背的人物形象,如机村里的阿妈斯炯、法海和尚和胆巴,居住在虫草山下的小桑吉和他的父母,围绕岷江柏而辗转的王泽周和贡布丹增等,让人真切地感受到那片雪域高原特有的风景与人情。

## 一、声音意象与作家内在情感的隐秘表达

一般来说,构成人们眼前世界的事物虽千差万别,但彼此并非孤立的,相互之间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或关联。人们通常可以借助感知、触觉以及意象来获取对自然万物的熟悉和了解。这里提及的“意象”,指的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经由创作主体情感活动而被创作出来的一种独特形象。作为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意象”在美国“意象派”诗歌代表人物庞德看来,不是一种图像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是“各种根本不同的观念的联合”<sup>③</sup>。在“符号论”美学代表人物苏珊·朗格看来,其真正功能则是“作为抽象之物,可

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sup>④</sup>。也就是说,“意象”具备某种象征意义,既可被视为一种描述存在,也可作为一种隐喻存在。

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乐感文化”,注重人在感官上的直接体验和真切体悟,尤其擅长从听觉上去观照世人眼前的大千世界,讲求个体情感的抒发与表达。从这个角度出发,声音与情感发生关联是通过人的听觉来对接和实现的。那些被创作主体赋予了一定的意义或思想的声音,尤其那些回荡于市井生活中的种种声音,“寻常巷陌的喧嚣市声与庭院街道里的琴声,融入个人主观情感后,就不再是一种听觉上的刺激,而是一种审美实践的对象,即声音意象”<sup>⑤</sup>。特定语境下的声音意象各自发挥着特别的表达功能,也被赋予特别的意义。纵览2010年以来阿来的中篇小说创作,不难发现,声音意象作为一种文本表达和情感体验,在“山珍三部曲”中均有不同寻常的呈现,不论是机村布谷鸟的鸣叫,或是小桑吉寄宿小学的钟声,还是河边那几株高大的岷江柏被风吹过的声音,都隐没于文本的字里行间、时隐时现,始终萦绕在雪域高原的深空之上。

小说的开篇就被一种声音所占据,这是作家的一种刻意而为?还是叙事节奏的某种预设?不论《蘑菇圈》还是《三只虫草》,以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开篇,或许正是阿来在小说结构安排上的一种有意为之,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合了作家在创作风格上的某种表达,“如果探究我在小说结构或节奏上有什么特点,我想提供一点参考,就是从音乐上得到的启发较多。我非常心醉于贝多芬们、阿赫玛尼诺夫们那样的展开,那样的回旋,那样的呈现,那样的咏叹,那样的完成。那是一种非常庄重典雅的精神与情感建筑,在我的理解中,小说也应该是这样一种庄重优雅的精神建筑。”<sup>⑥</sup>何况阿来又是一位十分注重情感深度的作家。他曾认为小说的深度除了有思想的深度外,还应有情感的深度,要在精神与情感两个层面上都有深刻的体验,“文学它的独特价值主

要还在于情感的沉潜与抒发,因此,我在自己小说中一定要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转移到人物身上去”<sup>⑦</sup>。《三只虫草》与《蘑菇圈》中以声音这一特别意象来开篇,在很大程度上预示雪域高原已有一种倾听自然、回归自然的迫切或悸动。这种接近人的本能的渴望或冲动,对亘古的雪域高原而言,更是走进灵魂的信仰之旅。不难想象,这些声音意象与雪域高原的生命世界密不可分,它们既是某种生机的彰显,更是自然生命的萌发。作家反复强调这些声音对于雪域高原以及“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同胞的深刻意义,足见作家那颗至诚至信的赤子之心以及对雪域高原爱之深沉。

坐落于雪域山谷间的机村,每年在深春与初夏交替的某一时刻,“群山间突然就会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这一声声“布谷鸟的鸣叫”捎来的是生机,唤醒沉睡了一个冬天的村寨,自此以后,机村的白昼慢慢长了起来,夏天也有了更多的生机与活力。对于世代繁衍生息于此的机村人而言,不论此刻他们身居何处、手头上正在忙着什么,当“听见山林里传来这一年第一声清丽悠长的布谷鸟鸣时,人们会停下手里正做着活,停下嘴里正说着的话,凝神谛听一阵”。机村人此时此刻的“停下”是短暂的,过后他们仍将继续劳作、忙手里正在忙的事、说嘴里正在说的话;然而,这短暂的停顿却是一种高度的自觉,充满着一种仪式感,其间既承载着机村人关于世界、关于自然、关于雪域、关于生命、关于生计、关于人情等诸多的渴望和希冀,更呈现出机村人对自然之神满怀的虔诚和由衷的敬畏。就在此刻,机村人以格外庄重的“静默”来向“布谷鸟的鸣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激,过程虽极为短暂、也貌似平常,却被像机村人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雪域山谷间的人们赋予了一个独特的精神内涵和带有传统意味的天性与自觉,“不止机村,不止是机村周围那些村庄,还有机村周围那些村庄周围的村庄,在某一时刻,都会出现这样一次庄重的停顿”。文本细处的“布谷鸟的鸣叫”宛如天籁般的自然之音,显露出大自然时节更替的

一种惯性与持续动能,就此拉开了包括机村在内的整个雪域世界焕发勃勃生机的生命序幕。

位于海拔3300米的寄宿小学的“钟声响了”,这是2014年5月初的某个日子,这时节恰是雪域高原上某种生命体即将萌发的高光时刻。对小桑吉和同学们来说,清晨校园的钟声总共敲三次。作为预备铃的第一遍钟声,校园里是一片喧闹与欢腾,女生们已在教室坐定,男生们却从不同方向奔向教学楼上的教室,“衣衫振动,合脚的不合脚的鞋子卜卜作响。男生们喜欢这样子奔跑,喜欢在楼梯间和走廊上推搡、碰撞,拥挤成一团跑进教室,这些正在启蒙中的孩子喜欢大喘着气,落座在教室里,小野兽一样,在寒气清冽的早晨,从嘴里喷吐出阵阵白烟”。这一朵朵蓬勃向上的生命之花正在雪域高原上纵情绽放,他们在求知的征程上互相追逐、竞相奔跑。当钟声接二连三响起,教室安静了,课也开始了。眼前从喧嚣渐渐趋于宁静,那一颗颗跳跃的心也平静下来,这里由“动”至“静”,再现了雪域既有的生命节奏与自然韵律,显现出高原生命的张力和韧性,也昭示了雪域民族由过去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然。作家以校园的钟声来开篇,极力烘托雪域上这种静穆而庄重的神圣气氛,从而为主人公小桑吉的“缺席”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氛围,也为接下来小说的叙事预设了一种悬念,如此“一石二鸟”的叙事效果,足见阿来笔力的老到与对高原生命的深度自信。

## 二、生态危机凸现下的现代反思与生态自觉

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在带给人类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大大强化了人类控制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空间,从而造成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空前膨胀。一时间,人类社会普遍沉浸在一种对科学技术狂热的痴迷与崇拜的氛围之中,再加上人类近乎爆棚的盲目乐观,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均在发生着潜移默化改变。从而使得原本引导社会摆脱传统束缚的人类理性,受到了极大的蛊惑,“对新的欲望的追逐(不是对满足欲望的追逐)是没有明显的终极线

的”<sup>⑧</sup>,人类逐渐走上了一条依赖理性、利用理性去认识世界、征服自然的“不归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飞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推动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类在物质上的欲求与渴望;与此同时“金钱拜物教”与享乐主义日渐风行,开始侵蚀着人的心灵,“价值理性”日渐式微。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却获得充足发展,甚至走向某种极端化,手段成了唯一目的。“在一定意义上,工具理性的张扬,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生态自然成了人类工具理性和资本主义目的理性的牺牲品,人类运用发达的科学技术过度地利用开发自然,成了现代社会的常态。”<sup>⑨</sup>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虽强化了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并由此形成种种便利和好处,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与此同时也导致人类社会面临着史无前例的生存挑战——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及人类自身发展的诸多困境。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曾指出:“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一起共舞翩跹。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固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借助于怀疑这些秩序,现代自由得以产生。”<sup>⑩</sup>对自然界既定秩序的怀疑或疑惑,显示人的觉醒的力量,也是现代人开始突破禁锢、走向自由的起点;从此以后,人在自然面前、在既有秩序面前不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主动性和开创性,其间含有自决的主体性倾向。然而,随着整个人类“消费数量和程度不断增加,维持地球所有生命的生态系统也变得更加危机重重,更多的人(首先是那些生态负债最深重的人)越来越远离自然世界,他们毫不在意自己对地球造成的伤害。”<sup>⑪</sup>不同于其他动物面对自然界时的那种被动,越来越主动甚或盲目

自负的人类,面对大自然暴露出一副愈发贪婪的嘴脸,以前所未有的疯狂去霸占有限的自然资源,致使大自然不堪重负。面对近乎死寂一般的世界,美国生态作家蕾切尔·卡逊甚为关切,以生态力作《寂静的春天》将世人的眼光聚焦到化学工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及自然生态的重大影响上,严厉批判当局肆意大面积滥用化学杀虫剂 DDT 而导致自然生态遭到致命性的破坏。要知道,这部堪称生态文学经典之作的出版和推出,不仅使生态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生态保护运动在更广阔的地区发展,还加深了人类对于自然世界的敬畏之感和生态关怀。

回到阿来的“山珍三部曲”及其所再现的事关雪域高原特有的“物产”书写,可见发生在雪域高原的人情世故深刻影响着阿来及其小说创作。多年来,阿来一直行走在川藏地区,这种近乎“零距离”的热切触摸,让作家可以时刻感受到来自雪域深处那汹涌的脉搏之声——这种声音既是大地之音,更是自然之声,它们响彻寰宇,激越人心,如机村里那一声声“布谷鸟的鸣叫”,如高原上寄宿小学校的“钟声”,如王泽周所住的村边“河水闷雷般的轰鸣”。这些现于文本缝隙间的声音,恰似无数生命的律动,与大自然的节奏完美合拍。许久以来,机村人对“布谷鸟的鸣叫”就有种天然的敏感与洞察,这种来自生命、来自灵魂的呐喊,惊醒了整个雪域世界,重启了芸芸众生的新的生命之旅。一年一度发生在这春夏之交的“布谷鸟的鸣叫”,在机村人的眼中,被寄予了更深一层的生命寓意与情感指向,它与雪域高原生命的轮回密切关联。那时那刻的布谷鸟之鸣,同样是一个种群获取新生的好兆头,自此以后那些被人们称之为“羊肚菌”的蘑菇“就在悠长的布谷鸟叫声中,从那些草坡边缘灌木丛的阴凉下破土而出。像是一件寻常事,又像是一种奇迹,这一年的第一种蘑菇,名字唤作羊肚菌的,开始破土而出”。大自然的机枢就是如此奇妙:一个个新的生命应“声”而起,好一派生机

盎然的生命图景即刻诞生。很大程度上,雪域世界里的“布谷鸟的鸣叫”可以说是生命强力的一种内在表达,冥冥中彰显的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隐秘力量。

而发生在机村人眼前的这一切,从阿妈斯炯还是斯炯姑娘时就存在着,纵使历经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即便阿妈斯炯已成为蘑菇圈大妈了,也依然如此,其间流淌着、延续着这个种群强烈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激流。岷江支流边的那个村子里的老柏树也在时代的改革进程中弯了腰,“一家人都觉得那树根仿佛像个什么东西,但又说不出到底像个什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上的极大富足,消费主义导致现代人对物质的追逐和欲求越发强烈,当越来越多的人以拥有一件岷江柏的物件来作为身份的象征之时,王泽周一家则从心底替越来越少的岷江柏呐喊出“濒危”的求救信号。眼见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及其发展的“急功近利”野蛮地掠夺了自然物种生存的空间,其后果必然导致大自然原有的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因此必须警示世人不要过度掠夺自然,唤醒人们呵护自然、维持生态之行为自觉意识。

### 三、生态观照中信仰的回归和人性的张力

作为从藏族地区走出来的作家,阿来的创作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雪域高原上族群的生存和日常生活境况。长期生活于四川藏族地区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沉淀,为阿来的创作积累了富足而深厚的素材和经验,而它们也渐渐成为阿来文学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或要素。脚下坚实的大地、头顶上的万仞苍穹、眼前的重重远山、生活在雪域高原上那些熟悉的虔诚信仰的人们,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让人感慨万千的事和情,阿来在创作中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再现。诚如作家在《河上柏影》“序言”中所写下的期待:“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以及经历过这一切之后,呈现出“人性的温暖”。

一直以来,阿来力图将笔触投注于纯净、呈现一

派原生态风貌的雪域高原,以数以百万计的文字耕耘对民族文化以及雪域高原自然生态的深切关怀。阿来敏锐地觉察到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不仅造成现代人消费观的畸形和扭曲,也会影响并危害到雪域高原特有的物产生态——致使雪域高原的生态越发的脆弱和难以为继。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势,作家感到隐隐地忧虑,故而在“山珍三部曲”中借助阿妈斯炯和小桑吉之口将这份“忧虑”表达出来,并希望借此引起世人的关注和警醒。当我们阅读《蘑菇圈》《三只虫草》时会发现,像阿妈斯炯和小桑吉这类人物,既不是充满传奇的英雄,也不是非比寻常的奇特另类,他们不过是阿来笔下最为普通、最富人情味也最具人间烟火味的平凡。不论以生命守护着“蘑菇圈”的老阿妈斯炯,还是心系虫草及百科全书的少年桑吉,并非只是通过文字简单塑形的“单薄”的个体,他们是生存于雪域高原上的藏族同胞的缩影,尤其在雪域生态今不如昔的境况下,这一老一少则更多地承载着雪域高原固有的生态密码和别样的人文风情。

《蘑菇圈》里的阿妈斯炯是一位淳朴善良、勤劳隐忍、温柔博爱的藏族母亲,生长在机村,待人诚恳和善,不论对事对人对物都一视同仁,以诚相待,因此她能在“波澜壮阔”的机村政治生活中顽强地活下来。在一般人看来,最怕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可斯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纵使遭遇种种不公,仍以满腔的真诚与善良对待周遭的人与事,并因此而赢得了他人的信任和温暖的回报——教会斯炯识野菜的王掌柜,在生命的尽头对斯炯道破了“天机”——“斯炯,去看看你的蘑菇圈吧。”而后斯炯便以一生守护着她的“蘑菇圈”,其间收获了“蘑菇圈”一年又一年的回馈——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让斯炯在机村饥荒年代里维持住了起码的生计。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与现代商业、消费经济争夺“蘑菇圈”的过程中,阿妈斯炯难以与之相抗衡,她精心呵护的“蘑菇圈”被发现,也随之遭到破坏,最后不得不

失去独属于她的“世外乐园”。面对失去“蘑菇圈”的阿妈斯炯及其遭遇,学者贺绍俊不无忧虑地提醒道:“蘑菇圈具有很深的象征义,它既是一个文化生态圈,又是一个自然生态圈。阿来并不排斥现代文明带来的进步和变化,但他通过斯炯的故事也在提醒人们,在追求进步的同时要小心任何一种强势的东西对人和文化的强制改造。”<sup>⑧</sup>阿来在向世人揭示传统的机村人面对现代社会介入雪域时表现出的深深的无奈和无助,阿妈斯炯的善良、博爱以及无私最终还是败给了消费经济以及丹雅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的为了利益不计后果、漠视情感、违背社会责任的“人性的晦暗”一面,致使阿妈斯炯朴实的自然生态观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举步维艰。

《三只虫草》中的小桑吉同样是个聪明善良、纯真开朗、体贴家人的藏族少年形象。他淳朴,在学校取消虫草假之时,依然“故我”地逃课去山上找虫草;他坚定,面对喇嘛的喜爱与眷顾,桑吉坚定地选择学习;他善良,在校长家里看到小孩子撕碎百科全书,他无法原谅校长,冲门而出,可是却在重点中学图书馆借阅百科全书时原谅了校长。就是这样一个纯净、明澈、聪慧的藏族少年,捧着他的三只虫草感念虫草山山神,就此与贪婪和罪过划清界限,继而保持住他对人性美好一面以及生态自然最为原始、最为纯情的向往和虔诚。虽然他失去了校长家里的那套百科全书,但因“三只虫草”的启迪,使他拥有了外面世界,拥有了更广阔的、更丰富的“百科全书”。如上所述,相比阿妈斯炯遭遇的“失乐园”,年少的桑吉因此而“得乐园”。面对雪域高原脆弱的自然生态,发生在这一老一少身上的一“失”一“得”可以说意味深远、发人深省。

#### 四、作家的故土情怀和生态意识的文本呈现

一般而言,阿来是以书写川藏高原而著称于世的当代作家,他从不回避与生俱来的藏族身份;他又是个不断行走于川藏地区的作家,以坚实的脚步丈量着故乡那片浑厚的、承载着族群世代繁衍的土地,

不断地通过饱含真情而富有诗意的文字来图绘故土世界的风景与人文以及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我们不难发现,阿来所做的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世人通过他的文字来读懂一个族群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将来,以及川藏地区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民情,不断拉近雪域与雪域之外的世界的距离,借以化解雪域内外不同世界的隔膜与不解。在雪域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物产风貌和地方风景,这里有的是与大自然相互敬重、彼此融合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生态,而这恰是雪域世界最富魅力之所在。而出生在藏族地区偏远农村的阿来,从小就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慢慢长大,他倾心于大自然和周遭世界所赐予自己的一切,对自然万物的生态关切是与生俱来的,其意识的自觉更是一种天性。特别在“山珍三部曲”中,随处可见阿来对于雪域高原自然生态的极大关切,一种莫名的隐忧和焦虑感隐现其间。

以雪域高原物产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山珍三部曲”,可以说是阿来对雪域高原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担忧与一种思考。恰如作家在小说中呈现的那样,随着人们对雪域高原无节制的索取和过度开发,一些地方为了片面追逐经济及社会的快速发展,以资源开发、生态旅游等“方式”直接侵入到尚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原生态区域,加之缺乏远景规划和一些人的“短视”行为,造成这些区域的自然生态破坏严重,有的甚至是不可逆的、毁灭性的破坏。阿来对雪域村庄的关注和表达由来已久,他曾说过自己“对藏族村庄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宗教、自然和社会的体验,我写藏族村庄,但它不是写单一民族的,是表现更广大的场景,是对人与自然、政治与文化、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整体思考”<sup>⑧</sup>。更进一步地说,体现在“山珍三部曲”中对于雪域高原自然生态的极大关切与人文关怀可谓作家这种“整体思考”的延续与保持。

《蘑菇圈》中描写的地处雪域山谷之间的机村世

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阿来书写川藏地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可以见到雪域民族与自然世界神性相通的诸多层面。作家眼中与大自然长期和谐相处的机村人,对于自然界给予他们的恩赐,既可以做到使用适度、有所节制,还常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即便那用没有脱脂的牛奶和娇嫩脆滑的羊肚菌烹煮出的“超凡的美味”,他们也不过是尝尝鲜而已。“并没有因此发展出一种关于美味的感官文化迷恋。他们烹煮这一顿新鲜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然后,他们几乎就将这四处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遗忘在山间。”机村人没有过于贪恋感官上的刺激与享受,面对大自然的恩泽,既不食“物”丧志,更懂适可而止,“依然浓茶粗食,过那些一个接着一个的日子”。可见机村人深谙与大自然相处之道,彼此之间合拍而融洽。相比之下,在1955年、1956年间进驻到机村的工作组却是另一番情形:一到蘑菇季,他们不仅率先大吃特吃羊肚菌,还自创很多吃法,令机村人大为不解,“这些导师一样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沉溺于口腹之乐”。他们以亘古未有的所谓的“革命”激情,假借现代文明之名,毫不节制地一味索取,“一个羊肚菌季节,至少吃了二十回牛奶烹煮的鲜蘑菇。”“嚯嚯,哪止二十回啊,那是去到一户人家的次数,要知道机村可有二十多户人家。”工作组这种“大胆无畏”之举,早已突破了机村人世代与自然保持平衡的生态底线,极可能造成机村世界中人与自然的空前对立,继而会导致自然界不堪重负,当然也可能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

藏民族世代繁衍在高原山谷之间,千余年来的文化积淀孕育出他们善良、坚韧、忍耐和悲天悯人的精神品格。长期以来,他们满怀着对世界、对土地、对冥冥之中自然力量的虔诚与崇敬,将自然界中的每一个体都视为赋有灵性、有情感的生命存在,不论四周世界里的动物、植物,或是雪山、草地、石头等,他们似乎与自然形成某种默契,两者之间达成相互

依赖、彼此共存的契约,同时对古老的神灵始终保持着由衷地敬畏与感激。可以说,藏民族正是恪守这份与自然共存的“契约”,从历史的深处一路走来,生生不息。纵使深陷当前这物欲洪流的物质时代,他们依旧坚持这份既有的真诚与对话。每年的虫草季正式开启前,像小桑吉父亲一样的村民们都会邀请寺里的喇嘛在虫草山下作法,以极为隆重的仪式来表达他们对自然万物的一种敬仰、一份虔诚,“人们聚集在溪边,那里已经用石头砌起了一个祭台。喇嘛坐在上首,击鼓诵经。男人们在祭台上点燃了柏枝,芬芳的青烟直上蓝天。喇嘛们手中的钹与镲发出响亮的声音时,仪式到了尾声。男人们齐声呼喊,献给山神的风马雪片般布满了天空。”雪域世界里的人们相信自然界有神灵存在,不仅对神秘的自然存有天然的敬畏,同时对于自然赋予的一切心存感激。

### 结语

纵观阿来2010年以来的小说创作,其言说的依然是那片被外界赋予神秘色彩的雪域高原。阿来一直行走在川藏雪域的大地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是他生命中最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不断言说雪域民族的动力之源和资源库。回望故乡,满眼皆是雪域之情;俯瞰雪域大地,尽心都是赤诚与淳朴。不论是《蘑菇圈》《三只虫草》还是《河上柏影》,作家都以无比真诚的文字来表达自身对藏族同胞那种难以释怀的款款深情和赤子之心。更大程度上,“山珍三部曲”这系列文本的呈现,不是常人的轻言碎语,而是作家真切关注、用心倾听雪域民族那发自肺腑的深沉呼唤的心声。阿来始终有一种“经世致用”的现世情怀,他以历史的眼光来观照雪域世界既往的岁月,在力图展现原本较为封闭的藏族地区遭遇现代化时所显露出的尴尬与不堪的同时,竭力彰显出藏民族那种与生俱来的真诚信仰和淳朴善良的自然人性,让雪域之外的人们看到雪域世界神秘之外的另一副面孔。同时,阿来也在观照当下藏族地区的社会现状,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工

业化、市场化的发展模式打破的不仅是雪域世界既有的自然生态,更重要的是固有的社会生态也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尽管信仰依旧,虽然虔诚依旧,但社会现实早已无法掩饰雪域高原普遍人性的深刻变化,正如《蘑菇圈》结尾处阿妈斯炯意味深长的感叹:“儿子啊,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文字背后所饱含的寓意将不断触发当代人的思考。

### 注释:

①黄轶:《生命神性的演绎——论新世纪迟子建、阿来乡土写作的异同》,《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

②本文所引《蘑菇圈》《三只虫草》作品原文出自阿来《蘑菇圈》,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河上柏影》作品原文出自阿来《河上柏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下文不再另注。

③汪耀进:《意象批评》,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④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7页。

⑤高秀川:《旷野中的时间、空间与声音:张爱玲小说的意象谱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⑥梁海:《“小说是这样一种庄重典雅的精神建筑”——作家阿来访谈录》,《当代文坛》2010年第2期。

⑦同上。

⑧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6页。

⑨黄协安:《人与自然:呼唤生态和谐——评厄普代克〈兔子歇了〉》,《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⑩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3页。

⑪朱利安·沃尔弗雷斯编《21世纪批评述介》,张琼、张冲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2页。

⑫贺绍俊:《品相和能指——2015年中篇小说评述》,《小说评论》2016年第1期。

⑬袁晔:《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作家阿来谈新作〈空山〉》,《人民日报》2005年4月28日。